郑州日报
ZHENGZHOUDAILY

精品文摘

■ 名流故事 17版 ■
■ 生活·男女 18版 ■
■ 史海·美文 19版 ■
■ 世态·开心 20版 ■

2007年4月6日 星期五
编辑 孙明道 电话 67655582
E-mail:zzwbwh1616@sina.com

安居是社会稳定的灵魂

几年前，在日本的旧书店，翻看一本老照片集。原来上世纪四五十年代，东京的银座也跑着“有轨电车”，与当年的北京王府井没什么不同。所不同的是，后来，东京人把有轨电车或埋入地下，形成地铁，或架到空中，形成“电车”。轨道交通的理念至今保存，并衍生了四通八达的轨道交通网络，承担起公共交通的功能。作为世界级的汽车生产、消费大国，公共运输设施反而是日本最常用的交通工具。

日本的火车大致始于明治维新前后。在战后经济发展中，日本的铁路建设立足于系统化，强调“人本原则”，便利、准时、快捷、舒适成为其运营目标。日本铁道综合研究所的首任理事长尾关雅则就曾强调，铁路必须考虑系统工程建设。这不仅是铁轨的系统化、还包括信号系统的网络化，更包含铁路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对接与关联。基于这种理念，日本的车站，总是深入居民区，甚至过街天桥都成为车站的设置地。而城际铁路与市内电车更是从不分家，车站与车站的连接，更是理所当然。

一般认为，日本的火车、地铁等交通工具发达，主要原因是日本国土狭小。而日本的政策设计者并不这样看。他们认为，城铁一旦与城际铁路连接，则可形成一个贯通全国、深入城市细微环节的系统。国民出行，集体一致，没有差别。舒适、干净、快捷、冷暖适度的公共交通工具，使得普通的上班族也可以穿着体面地去上班。笔者亲眼看到过一对老夫妇，干净整洁，神态安然，拖着小型行李箱包，自己去郊区旅游。而这在很多国家只有“有车族”才办得到。正是这种便利的公共交通系统，给人们提供了无差别的出行工具，使“局长通勤乘电车，一点不新鲜”，也扮演了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角色。更大的好处是，通往郊区的铁路带动了郊区发展，郊区房价、地价不比城里差，资产价值上升。城乡交界带没有了，社会安定了。

其实，从经济发展史看，大凡经济高速增长，总免不了社会扭曲。这种扭曲一方面表现为收入差距、地区差距的扩大，另一方面表现为历史归属感的丢失、民族认同感的散化，衍生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反差。这两方面都构成了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。在战后经济高速增长中，日本及早发现了这个问题。将社会再分配体制和基础设施的建设有机地进行结合，突出历史归属、民族认同以及百姓的习俗，形成了富有“精神内涵”的社会稳定体系。

一般而言，后发展国家普遍追求“城市经济”大发展，且在“城市发展模式”上，容易接受“不破不立”的理念。但作为“后发经济”的典范，日本却对城市的历史传承珍惜如命，因循习俗与习惯，顺势营建“城市港湾”，给人心留下熟悉的空间。记得第一次到日本进修，为找住处，检索了不少“房屋租借信息”。印象最深的是，多数信息强调“娴静住宅街”和“步行到车站几分钟”。后来发现，东京这个国际大都市原来有那么多的“城市港湾”。在这里，路并不是笔直、宽阔的，而是遵循着“路是人走出来”的自然法则。但不管多窄的路，总有清晰的标识；多么不起眼的路口，都摆着信号灯。而路边的房子、院子，大多很传统，绝不会有身在别国的错觉。而在近郊的城铁交叉路口，竟然还有“落杆”，信号灯的声音也是在电影里才听得到的摇铃声，宛如在明治时代。在“城市港湾”，感觉不到城市快速发展的烦躁。而“娴静住宅街”又不是与世隔绝，步行几分钟，便会找到城铁车站。

其实，战后60年，日本有足够的理由、时间，甚至资金和技术，把旧东京拆平，重建一个纽约。但东京的历代规划、经营者都没有那么做。随着城市的扩张，在东京，现在已经很难辨认哪里是城里，哪里是郊区。但人们却往往能感受到“城里的乡村味道”。日本的城市规划者主张“城市是人的空间”。“人总是在自己熟悉的空间里才能找到归属，才有心的安宁”。而人心的安宁，正是社会稳定的灵魂。

摘自《环球时报》

瑞典：强大的真实含义

在瑞典，我常看见一种很大的狗。任何想攻击它或它主人的人都会三思而后行。因为它是那样的强壮，比我国的藏獒还要强壮，以至能将任何攻击它的人轻而易举地撕得粉碎。可是这种狗却非常温顺，对人友好，所以人们在和它打交道时，都不得不怀着一种敬意或友好的心态。

瑞典这个国家就像这种大狗，它拥有世界上强大的军事科技，无论是陆军、空军还是海军的战斗力，都不逊色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强国，即使是二战时的希特勒德国和冷战时期的前苏联，也对它敬畏三分。

但两百多年来，在历次战争与争端中均保持中立，它不仅不欺负人，还常为别人被欺负抱不平。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是，当年中国大使馆被美机轰炸后，所有瑞典人都异口同声地谴责美国，并对中国表示同情。

不仅如此，瑞典还非常厚道和乐善好施，曾仁慈地接收了很多来自世界的难民，以至它的国民有百分之三十是难民构成。

很多人最初认识瑞典时，总会认为瑞典人的这种厚道与仁慈是装出来的，但是有两件不起眼的细节，却足以推翻这种基于自身狭隘心态的推断。一件就是这里的鸟，无论是鸽子还是麻雀，都不怕人，如果这里的人是假厚道，那么这里的鸟就会“说实话“。另一件就是这里的熊不咬人，除非在你对它有威胁时，它一般对人不具有主动攻击性，原因就在于这里的资源太丰富，熊可选择的食物很多，而要捕食像人这样具有高智慧的对象，对它来说是一种成本很高的选择，更何况这里的人对它们历来都很友好。对动物尚且如此，更何况人呢？

在我的母校有一个校训：“自强不息，厚德载物”。瑞典人的厚德载物就是两个字——“不争”。这种不争不是因它的软弱而不争，恰恰是因它的足够强大而不争：一方面，它强大而与人友好相处；另一方面，别人因它强大友好而不敢与之争，只能乐于与之交好。

瑞典人的不争具体表现在“三不争”上：一是不与天争。对瑞典人来说，没有争分夺秒这个概念，他们做事一向很有计划，一般事宜提前两个月就把日程表安排好，不会临时抱佛脚。即使是紧急情况，也能从容不迫，临危不乱。二是不与地争。瑞典人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注意到保护环境和资源，即使在成为世界最富10个国家之一的今天，它的绿化率还超过了70%，号称欧洲的绿肺。在瑞典很少看见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，因为他们不会为了虚假的繁荣，而牺牲森林和文物建筑。他们的环保意识从幼儿就开始抓起，无论是卧室的卫生间还是深山老林中的厕所，都是一尘不染。炎热的夏天，空调中的热气到地下热水供应系统中循环使用。三是不与人争。瑞典是一个资源相对于人口比较富裕的国家，这固然使它的人民的生存压力远远不如类似中国那么大，但要使几乎所有人都变成心态平衡，不具攻击性的“善良人”，却需具有资源分配与安排上的特殊智慧和新观念。

一个国家能达到这样自强而不争的境界，才是一种真实的强大。

摘自《都市文化报》

奇特行星的存在之谜

新发现一颗体积巨大但密度很小的行星，它对现有的行星理论提出了考验。

在太阳系外寻找行星的天文学家新近发现了一个怪东西：一颗体积比木星大一倍半、质量却只有木星一半的“行星”。以大小而论，它是迄今发现的最大行星；说到密质，它大概跟酒瓶上的软木塞差不多。根据现有的行星理论，这样的东西根本就不应该存在。

到目前为止，人们已经发现了200多颗太阳系外行星，其中大部分是通过观察恒星轨道的“多普勒摆动”而推断出的——这种摆动意味着恒星附近有一个天体，其引力影响着恒星的运动。

此外，在很偶然的情况下，如果恒星、行星、地球三者成一直线，行星就会引发“日食”现象，使恒星的光芒暂时减弱，地球上的人们由此也能发现行星的存在。

此前，科学家通过这种“日食”现象发现了一颗行星，它绕着450光年外的一颗恒星运转，与其他行星相比，它显得格外的大而轻。这颗被称为HAT-P-1的行星每4.5天对其恒星造成一次掩蚀（亦即“日食”），遮掉恒星1.5%的光芒。据推算，它有2.5个木星那么大，是迄今发现的最大行星。通过观察其恒星轨道的摆动，科学家推算出这颗行星只有木星的一半重。

根据现有理论，这样大而轻的天体是很难维持其存在的——行星诞生时是大而温暖的，但如果没有能量维持，它们会很快变冷并缩小。为了解释HAT-P-1的奇特存在，天文学家可要费点工夫了。

摘自《科技报》

人类为何看啥都像脸？

十年前，美国人戴安娜·比塞在一片自制的奶酪三明治上惊异地看见了一张“圣母玛利亚”的面孔。她当时完全被惊呆了，后来，她一直保存着这块三明治。最近，她把这块有“玛利亚”的三明治拿到了Ebay网上进行拍卖，没想到响应者众多，一块陈年的变质三明治最后居然以2.8万美元成交。从人们热情响应“面孔三明治”这件事来看，许多人都与戴安娜有着类似的经历。

2006年年底，欧洲宇航局发射的火星探测器“火星快车”拍到了一张高质量的照片，照片上的图像很像一张人脸，此事一出，人们又开始热议火星上究竟有无智能生命。

为什么我们会在各种地方辨认出人的面孔？这些面孔有时出现在星球的表面，有时隐藏在一摊墨迹里，有时又从一个牡蛎壳中浮现。对此，科学家们做出的解释也许能够帮助我们减少一些疑惑。

大脑中有特殊区域

德国不来梅大学的神经学专家多里斯也发现了人类似乎对面孔这一“影像”尤其敏感。她认为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人类的大脑中有一块特殊的区域，会优先处理有关面孔的信息，就像飞机上为头等舱的乘客提供快速登机通道一样。

为此她做了一个实验，给短尾猿猴播放各种“影像”的画面，同时用核磁共振仪对猴子的大脑进行扫描。她发现当屏幕上出现水果、玩具、可攀爬器械和面孔的时候，猴子的脑部有三个区域就会格外活跃。实验的结果证实了她的想法，大脑中有一些细胞对面孔信息格外敏感，优先进行处理。

“模糊处理”导致看什么都像脸

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认知科学专家帕万在开发面貌识别系统软件时，发现了大脑处理视觉信息的方式和电脑异曲同工。在开发识别软件的过程中，为了让软件成功“辨认”出要找的人，他们在系统中输入了成千上万张照片。他们发现，电脑可以顺利分析出多张面孔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，而对其他的物品的分析就不成功。

原来电脑是通过12对关键的对比关系来辨别人脸的，比如额头和眼部的明暗对比，额头处较亮，眼窝处则较暗；还有嘴唇和面颊的颜色对比，嘴唇较深、面颊较浅等等。

就像计算机在分析时会先找出共性再做判断一样，人脑在辨别面孔的视觉信息时也会采取类似的方式，由于这种“大而化之”的方法有其片面性，所以有时人类犯错，一头黑白花的奶牛身上也存在着明暗和颜色的对比，所以人们会从奶牛身上看出类似于人脸的“影像”。

人类对面孔“反应过度”

对于这个现象，波士顿大学的神经学家塔克的解释是，因为面孔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出现得太多，所以人类的大脑往往会对这种刺激做出最快、最直接的反应，人们在其他物品上看到人脸则是一种“反应过度”的表现。

识别面孔对于人类的重要性不言自明，同时人的面孔还包含着非常丰富的信息，从一张脸上可以辨别出身份、情绪、健康状况等许多信息。正是由于辨认面孔的重要性，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变得对面孔越来越敏感。

摘自《深圳晚报》

ZHENGZHOU DAILY
编辑 孙明道 电话 67655582 E-mail:zzwbwh1616@sina.com

名流故事

陆定一最后的遗言

陆 德

为理想而投身革命

我的父亲陆定一，出身于江南名门望族，从小生活条件优越。他不是生活所迫才闹革命，而是为了实现救国的理想，才义无反顾，甘愿去抛头颅，洒热血的。

父亲曾两次遭受王明左倾路线的打击迫害。长征前被一撤到底，扛着梭镖参加长征。并在遵义会议后恢复工作时，提出了“万里长征”这一载入史册的政治术语。他的爱人被开除党籍留在敌后，被国民党“铲共团”抓住，开膛破腹壮烈牺牲。但父亲在逆境中，写出怀有革命必胜的乐观主义的《老山界》，后来，这篇文章入选中学语文教材，几十年来教育了几代人。

在抗日战争中，父亲是第二次国共合作、重庆谈判的七位中共代表之一；在胡宗南20万大军进攻延安时，由他为政委、任弼时为司令的中央直属队，跟随毛主席转战陕北，保卫了党中央。

父亲是中共“七大”中央委员中唯一的一位大学毕业生，长期从事新闻和文化工作。父亲多年负责党的文化教育和宣传工作，他提出了党的新闻定义和教育方针，并积极推动形成了“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”方针。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主要政治中心的年代，父亲以超人的勇气和魄力，提出要允许艺术和科学改造，“有独立思考的自由，有辩论的自由，有创作和批判的自由，有发表自己意见、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”，提出允许不同学派和新的学派的树立，提出要把文学艺术问题及科学技术研究“同政治问题区分开来”，在知识分子中享有很高的威望。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，他是各共产主义政党中担任宣传部长时间最长的人（22年），他是个马列主义理论家，对党的新闻事业和新闻学理论作出了贡献。今年6月9日，是父亲诞辰100周年，中央开会纪念了他。

坚持真理刚直不阿

父亲有着知识分子刚直不阿，敢于直言，坚持真理的品质。上世纪60年代初，北京市曾经要拆除故宫去修马路，父亲冒死进谏，才使这座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得以保存下来。说是“冒死进谏”，是因为毛泽东主席已把不同意拆除古建筑看成是政治态度问题，说：“这些遗老遗少啊，当亡国奴（日本侵占北京）他们没有哭，拆几座牌楼古坊，就要哭鼻子?！”

父亲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，他担任中宣部部长期间，每天都工作到半夜2点，要审看人民日报上的重要文章。我虽然与父亲生活在一起，但与他见面交谈的时间都很少。在三年困难时期中，我曾有机会跟父亲去过一次甘肃。有一天他说要去打猎，自己去外面绕了一圈，回来后跟我母亲说：“立刻回北京，饿死人了。”后来中央派人去调查，终于发现甘肃饿死几十万人的真相。

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他恢复工作，这么多年只做过一套灰颜色的中山装，在接待外宾或开会等正式场合中穿。而从恢复工作到他去世的16年中，他的房子从未换过家具。“文革”浩劫中，父亲、母亲，我的叔叔还有三个阿姨，都受到严重迫害，全家人加起来等于被关押了63年。外婆在监狱里去世。父亲在监狱里被吊起来受审讯，关押了13年，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与王光美一起被放出。我在清华大学无线电专业还未毕业，就被批捕，在狱中关了6年，被打断了肋骨……

我和父亲同一天生日，6月9日，中间相差36年。1942年我在延安出生时，是那里最困难的时期。母亲没有奶水，没多久我从出生时的4磅半瘦成了3磅。当时党中央政府只有一头奶牛，朱德把每天给首长的一瓶牛奶给我，并把仅有的一个暖水袋给我保温，使我得以存活。父亲为我取名陆德，就是要我记住朱德，以德报德。

我高中时有个暑假，跟他去了北戴河。他辅导我读了三篇文章，一是老子的《道德经》，还有两本是毛泽东的《矛盾论》和《实践论》。他给我作了详细的讲解。他对子女的要求是：好好学习科学技术，不要搞政治，也不要当官。

最后反思严于律己

父亲在晚年，对他的工作和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经验教训，进行了反思，并在多种场合和会议上，坦率地表露自己的观点。如今他已去世10年，但他的一些认识，仍有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。

父亲对历史问题的处理和政策上的反思，认为应“宜粗不宜细”，从大局出发，认清大是大非问题，统一思想认识，不要纠缠到具体的小事中去计较个人恩怨得失；但对历史教训的分析和总结上，则应该“宜细不宜粗”。父亲说：“总结是为了不再重犯。从‘反右’到‘文革’，我们党有过多少深刻的教训？‘一言堂’，我们又分析过几次了？从分析陈独秀的‘家长制’开始，还是屡析屡犯，就是不敢触及它是封建主义专制残余的根子上。”

父亲多次谈到，毛主席犯的错误，“我也有份”，在和于光远等同志的谈话时，在中央顾问委员会上的讲话中，他都多次提及，说：“毛主席所犯的错误，不是他一个人的错误，历史不是一个人走出来的，我们都拥护、支持和执行过，是全党一起走的。我是中央的领导成员之一，主管文教和宣传工作，主席在这方面的错误，我也有份，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。”

他还说：“我做中央宣传部长这么久，我的工作犯了很多错误，斗这个斗那个，一直没有停。许多是毛泽东同志嘱咐的，我照办了，我有对毛泽东同志个人崇拜的错误，也有一部分是自己搞的，当然由我负全责。”

父亲还谈到，“反右斗争中，我左了。我要给许多同志赔礼道歉。当时我认同了主席对知识分子的分析，并且是全心全意照他的意见去做的。”

历史跟父亲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。他感叹说：“本来我的认识已经左了，后来越来越不理解，跟不上，直至文化大革命，我成了‘绊脚石’，被关进了监狱。”

面对改革开放时期，社会经济文化出现的种种变革，我和父亲也有过几次较深的探讨。

我曾问父亲：“如今又出现了剥削和资本家，知识分子又该如何界定呢？”父亲回答说：“这个问题，由你们去解决。”

父亲说过：“我们是一个政党，而不是生产党，也不是学术党，很多东西我们不懂，也不可能全懂，什么都要管，都要‘越俎代庖’。想‘事事有为’，结果反而会‘事事不为’。”

1996年5月初，父亲病危中，断断续续地说：“要让孩子上学！……要让人民讲话！”

然后，他陷入昏迷，再也没有醒来。5月9日，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。那两句，是他最后的遗言。

摘自《新民晚报》

王小列：摄影、导演两相宜

1998年，李琳主演电影《遥望查里拉》时，认识了导演王小列。这对他们是一次难忘的合作。后来，他们相爱并走入婚姻。

在西藏拍摄的《遥望查里拉》是王小列第一次做导演，之前他作为摄影师在影视圈已经享有盛名，主要作品包括《顽主》(1988)、《开国大典》(1989)、《甲方乙方》(1997)等。近年来，他接连导演了《康定情歌》(30集)、《范府大院》(41集)，都取得了不俗的收视率。正当王小列的导演才华越来越被观众认可的时候，他突然又作为摄影师出现在中影集团的年度影片《云水谣》中。

救场

说起《云水谣》的“救场”经历，他显得轻描淡写：“摄影师原是穆德远，他和尹力搭档，前期工作做了很多，足足两个多月。电影在西藏开机以后，穆德远高原反应很厉害，只得送医院，呼吸还有身体其他各方面都不太好。尹力就打电话找我，这样我就去了。”

仓促上阵，王小列更多要凭直觉和依靠自己在这个行当里多年积累的经验。

拍摄的时候，许多场景都深深打动了王小列。片中有一场戏，陈秋水的儿子（陈坤饰）通过网络视频和远在台湾的老年王碧云（归亚蕾饰）对话。王小列当时就是拿一个小DV在拍，为演员布好光之后，他突然感到莫名的感动，他的心里因此有了起伏。王小列非常珍视这种感动，他坚信如果拍摄时处于这样的状态之中，摄影师就一定能够把自己的感受通过画面传达给观众。

《云水谣》提供了有巨大反差的环境变化，王小列拍得十分过瘾。看剧本的时候，他凭借摄影的直觉，就预感到片子出来以后一定会好看。

西藏拍摄期间，演员们的敬业精神给王小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完成片里，徐若暄在西藏只有一个镜头；为了这一个镜头，她跑了一趟西藏。陈坤的戏份最重，有一场戏他要在海拔5000米的地方背着李冰冰走在没及膝盖的雪地里，每一条镜头下来，他都要长时间吸氧。特别是李冰冰，高原反应非常厉害，手指的末梢神经严重麻木，手指头已经不听她指挥了。但顶着这样的压力，李冰冰出色地完成了角色的拍摄。

做导演，要承受比做摄影师大得多的压力，对这一点王小列体会很深：“作品的好和坏就是导演的责任，没有任何借口可以推到别人身上。片子出来有没有人看，收视率好不好，都是在检验导演。现在圈里竞争很激烈，一部戏拍得不好，下面找你拍戏的人马上就会很少，你就会面临失业的问题。”

生活

和很多明星夫妻不一样，王小列并不避讳在记者面前谈自己的妻子，知名演员李琳。他们在拍摄《遥望查里拉》的时候认识，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才建立起恋爱关系。

两人婚后十分和谐，王小列说，李琳最喜欢做的就是给他买东西。每次李琳为他买衣服，回来他一穿，绝对合适。

他能做的就是两人一起休假的时候，尽量陪着妻子，“我们上哪儿都一起。”可惜的是，这样的日子太少了。王小列算了一下已经过去的2006年，他们两人待在一起的时间不超过两个半月。

影视圈就是这样，人是剧组的只有等手中的戏杀青，才有机会回到那个叫做“家”的地方。像王小列和李琳这样，一个做导演、摄影，一个做演员，要恰好碰上同时休假，更是难上加难。以前王小列也没有意识到这对于婚姻会不会是个问题，他也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，两人就已经过了这么长时间。有一次无意看到自己的电话单，他才猛然醒悟，原来他们是这么频繁地通电话！电话费竟然是他们家最大的一笔开支。应记者的要求，王小列评价了作为演员的李琳：“从最近的一些戏，我感觉她还是变化很大的。原来她很本色，但是从《历史的天空》开始，尤其是《搭错车》，我觉得她在塑造人物方面有了很大的变化。和一些好演员在一起，她比原来成熟了。分寸感对一个演员来说很重要，是一个水准的标志。”

摘自《大众电影》

鲍威尔的幽默

你愿意跟我睡吗

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曾给一家著名的家具公司当过一年多的推销员。1978年的时候，那家家具公司面向社会征求广告用语，鲍威尔也参加了应征，他给床垫设计的广告用语是：“你愿意跟我睡吗？”一举中标，而且这句广告用语一直沿用至今，现在仍有很多老朋友拿这句广告词来跟他打趣。

忍无可忍也得忍

克林顿执政期间，鲍威尔还不是国务卿。有一次，克林顿在对叙利亚是否动武的问题上进行咨询的时候，挑战性地问道：“作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，或者说是一个男人，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应该一忍再忍呢？”一时间大家都沉默不语。这时，鲍威尔站起来说：“在妻子骂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忍无可忍也得忍。”谁也没想到一向比较严肃的鲍威尔会这么说，一时哄堂大笑。也许是鲍威尔的这句话起到了一定的作用，美国最终没有对叙利亚动武。

又走投无路了

鲍威尔跟一个名叫戴维的大富翁是好朋友，戴维四十多岁时娶了二十来岁的姑娘苏珊。苏珊是位破落资本家的女儿。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，戴维也破产了，于是苏珊跟他闹起了离婚。戴维有些想不通，他跟鲍威尔说：“你说苏珊当初为什么拼死拼活一定要嫁给我呢？”鲍威尔想了想说：“那是因为她的父亲破产了，她走投无路了。”戴维问：“那她为什么现在偏偏又要跟我闹离婚呢？”鲍威尔说：“那是因为你现在也破产了，她又走投无路了。”

怕与不怕

鲍威尔曾当众解读过什么叫勇敢。他说：“所谓勇敢，应该包括两个方面，一是迎战不应该害怕的任何东西；二是害怕应该害怕的东西。”此话不可谓不经典。

平均分更重要

有一次鲍威尔答记者问。有记者问：“您认为事业和家庭哪个轻哪个重？”鲍威尔说：“我认为人生应该有四道试题：学业、事业、婚姻和家庭，只有平均分高才能算及格，切莫将太多的精力用在其中的任何一道题上。”

摘自《中国剪报》